

# 论扬雄的著述活动及文体实践

夏德靠<sup>1</sup>

**【摘要】**扬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成书，一是散篇。成书包括《太玄》《法言》《方言》《蜀王本纪》，除《蜀王本纪》外，余则保存较完整；散篇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完篇流传，二是残篇，三是存目。另一方面，扬雄在著述活动中崇尚模拟，这一行为之产生与其独有的“述作”观念有关。扬雄在“述作”问题上提出在义理方面是“述”，是继承；在文辞上是“作”，是创新。这是一个不同于他人而又很有意思的说法，显现扬雄在文献创制上的一种新的认知态度。对于扬雄的效仿，应该看到他效仿的主要是经典的体式，或者说文体，至于内容则大体出于他个人的创制。在文体方面扬雄在效仿之同时也有创造，从而为后来的文体生成积累可贵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扬雄；述作；模拟；文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9-0005-11

扬雄不仅是汉代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很多领域都卓有建树，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不过，他的许多著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效仿。扬雄在自己的著述活动中为何热衷于效仿，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进行多方面的解读，我们在这些研究之基础上，主要从文体实践的角度去加以把握。

## 一、扬雄的著述活动

在汉代学者群体中，扬雄可以称得上是高产的一位，其兴趣之博、著述品种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少有的。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著录“《训纂》一篇”，又著录“扬雄《苍颉训纂》一篇”，关于后者，王先谦指出：“此合《苍颉》《训纂》为一。下文所云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也。”<sup>[1]</sup>此说法实源于《汉志》的这一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sup>[2]</sup>这就比较清楚地交待上述著录的缘由。姚明辉先生还分析说：“《苍颉》先时为五十五章，扬雄续易为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也。以《苍颉》章六十字例之，当为二千四十字。合《苍颉》三千三百字，为五千三百四十字。故许氏《说文叙》曰：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sup>[3]</sup>需注意的是，《汉志》“小学”类还著录“《别字》十三篇”，钱大昕以为“即扬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sup>[4]</sup>又“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sup>[5]</sup>梁启超先生说：“今存《太玄》《法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项目编号：17BZW07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德靠，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浙江湖州 313000。

言》《州箴》《官箴》，《乐》四篇已佚。”<sup>[6]</sup>姚明輝先生论道：“《后汉书·胡广传》：‘初雄《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亡阙。’然则雄《箴》二种，东汉以后当存二十八首也。今案《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诸书所载，有《州箴》十二首，《官箴》十六首，如传言。”<sup>[7]</sup>姚先生只是节引《后汉书·胡广传》，原文为：“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駒騶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sup>[8]</sup>这就比较明确地交待《官箴》的情况。姚氏以为扬雄《州箴》十二首、《官箴》十六首，《四库全书总目·扬子云集提要》说：“雄所撰诸箴，《古文苑》及《中兴书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读书志》称二十八篇，多《司空》《尚书》《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复益以《太官令》《太史令》为三十篇。考《后汉书·班固传》注引雄《尚书箴》，《太平御览》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则朴之所增，未为无据。然考《汉书·胡广传》称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又世止二十八篇。刘勰《文心雕龙》称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则又亡其三，不应其后复出。且《古文苑载司空》等四箴，明注崔骃、崔瑗之名。叶大庆考古质疑》又摘《初学记》所载《润州箴》中乃有‘六代都兴’之语，则诸书或属误引，未可遽定为维作也。”<sup>[9]</sup>严可均《全汉文》收录冀州箴、青州箴、兖州箴、徐州箴、扬州箴、荆州箴、豫州箴、益州箴、雍州箴、幽州箴、并州箴、交州箴十二州箴，以及司空箴、尚书箴、大司农箴、侍中箴、光禄勋箴、大鸿胪箴、宗正卿箴、卫尉箴、太仆箴、廷尉箴、太常箴、少府箴、执金吾箴、将作大匠箴、城门校尉箴、太史令箴、博士箴、国三老箴、太乐令箴、太官令箴、上林苑令箴二十一官箴，州箴数目一致，官箴则多出五篇。严氏解释说：

《后汉·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駒騶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棚、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sup>[10]</sup>

对此，余嘉锡先生指出：“严氏所考，至为精密，过陈振孙章樵辈远甚，可以释《提要》之疑矣。”<sup>[11]</sup>解决了《官箴》篇目，但《州箴》的问题仍然存在。《胡广传》以为扬雄制作十二篇，可《汉书》本传只说“作《州箴》”，颜《注》引晋灼云：“九州之箴也。”<sup>[12]</sup>《后汉书·胡广传》李贤注说：“《扬雄传》曰：‘箴莫大于《虞箴》，故遂作《九州箴》。’”<sup>[13]</sup>李贤所引述的《扬雄传》与今本不同，不知何据，但也认为扬雄所作为九篇。《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引崔瑗《叙箴》曰：“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管箴规匡救。”<sup>[14]</sup>这可能是扬雄制作九箴的最早记载。据《后汉书·胡广传》，崔瑗续作早于胡广，且崔氏本人又善于“书、记、箴、铭”，<sup>[15]</sup>那么他对于扬雄《州箴》《官箴》自然熟悉，其说法应也就更为可取。流传的十二首《州箴》，经束景南先生的考证，“幽、并、交三箴，恰有明显作伪之处”，乃出于后人的增附。<sup>[16]</sup>《汉志》还著录“扬雄赋一二篇”，顾实先生分析说：“后注云，‘人扬雄八篇。’盖《七略》据《传》言作四赋，只入《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四篇。班氏更益、篇，故十二篇也。其八篇，则本传：《反离骚》，《广骚》，《畔牢愁》三篇。《古文苑》：《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三篇。又《文选》有《核灵赋》。《全上古三代》文载有《都酒赋》二篇。凡八篇；若益以《解嘲》《解难》《赵充国颂》《剧秦美新》诸篇，则溢出十二篇之数矣。”<sup>[17]</sup>

《隋书·经籍志》对于扬雄著述有如下记载：《方言》十三卷、《三苍》三卷（汉扬雄《训纂篇》）、《蜀王本记》一卷、《扬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原注：扬雄撰，李轨注。梁有《扬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扬子太玄经》九卷（原注：宋衷注。梁有《扬子太玄经》九卷，扬雄自作章句，亡。）、

《扬雄集》五卷。其中《蜀王本纪》、《扬雄集》不见于《汉志》，《四库全书总目·扬子云集提要》说：“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已非旧本。明万历中，遂州郑朴又取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书及类书所引《蜀王本纪》《琴清英》诸条，与诸文赋合编之，厘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是书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笔乘》之文。”<sup>[18]</sup>余嘉锡先生分析说：

《汉书·艺文志》为《七略》之要删。雄之著作，仅《六艺略》小学家有《训纂》一篇，《诸子略》儒家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诗赋略》有扬雄赋十二篇，无所谓“扬雄集”也。……且雄集除《隋志》《新唐志》外，《旧唐书·经籍志》亦著于录，《提要》略而不举，亦为疏漏。考《崇文总目》别集类，两汉人之集，仅有董仲舒、蔡邕、陈琳三家，隋、唐相传之《扬雄集》，盖已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矣。<sup>[19]</sup>余先生指出《汉志》无《扬雄集》，《提要》失考是对的，并推测《扬雄集》亡于唐末五代之际。然而，《隋志》著录的这部《扬雄集》成于何时，张震泽先生以为：“《隋志·集部》著录以楚辞十二卷为始，此书正是东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证知别集起东汉之说是对的。王逸之书录汉《楚辞》有刘向，独不录扬雄，最大的可能是那时已有《扬雄集》通行。”<sup>(2°)</sup>可见《扬雄集》最晚在王逸时代已经存在，只是未能流传下来。据《提要》，宋代学者谭愈曾经重编五卷本《扬雄集》，此后郑朴又编辑六卷本，《提要》著录的《扬子云集》即是郑本。余嘉锡先生说：

《郡斋读书志》卷十七曰：“《扬雄集》三卷。古无《雄集》，皇朝详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离而不属，因缀绎之，四十余篇。”《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六作《扬子云集》五卷，不著编辑者名氏，但云：“大抵皆录《汉书》及《古文苑》所载。”此两本卷数既不同，则其文之多寡，未必无异，且谭愈所辑，是否纯取之《汉书》及《古文苑》，未可知也。《通考·经籍考》以五卷本著录，而兼载晁、陈之言于下，《提要》乃取而联缀之曰：“宋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其实与谭本不合，岂非但知摭拾《经籍考》而未假分析言之乎？《宋史·艺文志》有《杨雄集》六卷，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亦云“《扬雄集》六卷，四十三篇”，盖又别是一本。然则宋之辑《雄集》者，非只一家而已。<sup>[21]</sup>这些集子除《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五卷的内容比较清晰外，余者并不很清楚。《提要》介绍郑本收录扬雄著述的情况，张震泽先生编纂的《扬雄集》收录作品五十七篇，他说：“原拟通扬雄散篇及成书《太玄》、《法言》等合编而校注之，并以《四库》本为底本。后来改变了主意。因明刻郑本既不易得，即《四库》专藏亦难借抄。且文人别集例不收成书，遂决定本集只收散篇而捨成书，惟《蜀王本纪》仅存片段，不成章节，姑入集中。”又说：“唐宋以前之辑本不复可见，明人重辑，除专集外，有梅鼎祚《西汉文纪》，张采《历代文抄》，均不收歌赋。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以张燮《汉魏六朝七十二家集》为蓝本而以冯氏《诗纪》、梅氏《文纪》补缀成书，其中有《扬雄集》，且收歌赋，但其书舛驳多误，不可据。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综合诸辑，较为完备。故本书即据严辑复查出处，删其不当，补其缺遗，凡得五十七篇。”<sup>[22]</sup>张氏《扬雄集》收录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核灵赋》《太玄赋》《逐贫赋》《酒赋》《反离骚》《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对诏问灾异》《答刘歆书》《与桓谭书》《难盖天八事》《解嘲》《解难》《蜀王本纪》《赵充国颂》《剧秦美新》《连珠》《元后诔》《琴清英》及十二《州箴》、二十一《官箴》同于严辑，还将《扬雄自序》收入。至于严辑的《广骚》《畔牢愁》被置于附录《扬雄佚篇目》，张先生在《扬雄佚篇目》中还收录《天问解》《乐》四《县邸铭》、《玉卮颂》《阶闕铭》《成都四隅铭》《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及《仓颉训纂》。对于严辑的《与桓谭书》，张震泽先生说：“严辑《全汉文》录二通，皆残文，分别题为‘《与桓谭书》’、‘《答桓谭书》’。今按前篇二句出于《文选注》，确题‘《与桓谭书》’；后篇严氏漫题‘《答桓谭书》’，则无根据。”<sup>[23]</sup>张先生《扬雄集》未收《家牒》，严可均说：“《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五十并引杨雄《家牒》。案，《家牒》不知何人何时所撰，今附载《扬雄集》后。”<sup>[24]</sup>即使严氏本人也未能考证

《家牒》的制作情况，张震泽先生不予收录是可以理解的。整体观之，张先生编纂的《扬雄集》对于扬雄散篇的收录（包括佚篇）是比较全面的。

但是，就扬雄的著述而言，有些地方还需注意，《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谓：“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sup>[25]</sup>李周翰指出扬雄曾经撰写《绵竹颂》，且杨庄又在成帝面前朗诵过此作品。不过，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玉卮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sup>[26]</sup>据此，杨庄诵读的很可能就是《县邸铭》《玉卮颂》《阶闼铭》《成都城四隅铭》。《甘泉赋序》提到“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李善《注》说：“雄《答刘歆书》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sup>[27]</sup>李善认为杨庄诵读的是《成都城四隅铭》，而刘良则说：“客则杨庄也。荐，进也。雄文则《绵竹颂》也。”<sup>[28]</sup>其理解同于李周翰。按照常理，杨庄诵读的作品当以《答刘歆书》为准，因为这毕竟是当事人自己撰写的。可问题在于，据《答刘歆书》的表述，杨庄诵读的很可能是四篇作品，这似乎不太可能，李善大约也觉察到了，强调诵读的只是《成都城四隅铭》。李善虽然解决诵读的问题，但又与《答刘歆书》的表述发生矛盾。倘若依据刘良、李周翰的说法，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然而从可信度来看，当首先考虑扬雄本人的说法。因此，有关杨庄诵读的作品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有一点似乎不存在疑问，即扬雄确实撰写过《绵竹颂》，否则刘良、李周翰就不必如此说了。黄开国先生说：“《宋史·艺文志》著录《四注孟子》十四卷，其中之一为扬雄注。”<sup>[29]</sup>王春淑先生认为扬雄有《续史记》《志录》。<sup>[30]</sup>至于《答茂陵郭威书》，王春淑先生分析说：“诸家辑本，如《汉魏六朝一百三家》、梅鼎祚《西汉文纪·扬雄》、四库全书本《扬子云集》等皆录。但严可均以为此二篇乃桓谭、郭威缀拾扬雄之语，而非扬雄所答之书。”<sup>[31]</sup>总之，扬雄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成书，一是散篇。成书包括《太玄》《法言》《方言》《蜀王本纪》，除《蜀王本纪》外，余则保存比较完整。至于散篇，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完篇流传，二是残篇，三是存目。比较起来，扬雄散篇流传的效果较成书要差。

## 二、扬雄的文体实践

有关扬雄的著述活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即模仿行为。《汉书·扬雄传》是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献，据颜《注》，《扬雄传》“赞二一以前的部分采自扬雄的《自序》，而“赞曰”出自班固。本传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星程，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sup>[32]</sup>其买。扬雄并不讳言对经典的模仿，本传又说：“怪茁京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3其文，……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珉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sup>[33]</sup>扬雄虽然订屈原含有不满，但这些撰述活动无疑是对屈品力模仿。《解难》也明确写道：“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sup>[34]</sup>当然，对于扬雄模仿行为最全面的表述来自班固的评论，他在《汉书·扬雄传》“赞曰”中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sup>[35]</sup>按照这个评论，扬雄的作品几乎都是模拟的结果。可是，对于扬雄著述活动的认知倘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人们已经注意到汉代效仿模拟风气与经学之间的关联，“汉代经学讲求传统，西汉重师法，东；又重家法，这种传授方式影响了汉代摹拟文风的形成。”<sup>[36]</sup>可是，对于扬雄来说，他生活在“两汉之际师法毁坏、家法未立的时代断裂期”，并且又是不满西汉师法的，<sup>[37]</sup>因此，从这一角度去思考扬雄的模拟行为似乎并不恰当。《庄子·天下篇》说：“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sup>[38]</sup>“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即王官之学，而王官之学在本质上为史官之学。

东周以降，王官之学发生裂变，诸子之学勃兴，“道术将为天下裂”就反映了这种局面。史官之学强调即事言理，理即蕴含在所载录的史事之中；诸子则多空言义理，重理而轻事。这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文献方式。孔子“述而不作”的诠释策略，其实是对史官著述传统的自觉继承。孔子藉著述来寄寓微意、实现其政治构想，从而达到文化创造的高度，这就树立了汉代士人企慕的榜样。<sup>[39]</sup>可是孔子的王者态势也给两汉士人的著述活动带来巨大的威压感。比如司马迁尽管以孔子的继承者自许，但在论定自己的著作时表现了极为谨慎的态度。面对壶遂“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的诘难，他争辩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sup>[40]</sup>司马迁一方面声称要效仿孔子，立志“成一家之言”；同时又否认《史记》“作”的性质，这一矛盾心理说明什么呢？于迎春先生分析说，汉代现实没有赋予一般士人随意褒贬天子是非的权利与资格，士人们难以拥有批判的可能。他们除了接受皇帝的统治之外，还要表示对圣人及经典的充分敬重和臣服，这包括对写作活动的资格与名号的尊敬。“作”之为圣人品格的有机构成，已成为任何人不得僭越的资格，于是传释、训解圣人的经理大义，就成为士人文化事业的基本内容和方式。<sup>[41]</sup>在“作”被推崇为只有圣人才可成就的伟大创造这一语境下，司马迁承认自己是“述”而非“作”的表述就可以理解了。此后王充在述作问题上也被人加以责难，王充强调《论衡》一书既非作，亦非述，而是“论”，这其实只不过是王充为了避免时人以“非圣无法”来攻击自己的一种巧妙说法。<sup>[42]</sup>但王充为什么要用迂回的方式来摆脱在“述作”问题上的僵局呢？且不论王充是如何看待“作”与“论”之间的关系，但其退避本身表明王充还不敢以“作”自居，即他并没有超越“作者之谓圣”观念的束缚。扬雄也特别推崇孔子，《法言》中的“圣人”有时就专指孔子。同司马迁一样，扬雄在著述时也有意效仿孔子，仿《论语》而作《法言》就很好地体现这一点。他拟经的这些举动颇引起世人的非议，《汉书》本传说：“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sup>[43]</sup>对此，扬雄在《法言·问神篇》中解释说：“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汪荣宝疏之曰：“谓《玄》之义理亦述也，其文辞则作耳。”<sup>[44]</sup>司马迁对于他人的诘难，坦率承认自己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sup>[45]</sup>即是不敢以“作”自居。扬雄在“述作”问题上有所分别，指出自己在义理方面是“述”，是继承；在文辞上则是“作”，是创新。这确实是一个不同于他人而又很有意思的说法，显现扬雄在文献创制上的一种新的认知态度。扬雄敢于承认自己著述活动中创造的一面，可以说扬雄效仿的主要是经典的体式，或者说文体，至于内容则大体出于他个人的创制，不过即使在文体方面扬雄在效仿之同时也有发展。

《太玄》是模仿《周易》的，但其间也存在变异，对于二者的关系，徐复观先生有一段分析：

《易》的基本符号—、--，《玄》的基本符号是—、--、---。但《易》之两基本符号，乃各象征固定之物，—象征阳，--象征阴，通六十四卦而其义不变。但《玄》的三基本符号，仅是为了便于错综变化，并不固定象征某一物。……在扬雄看来，道本身即含有“三”，《玄》是道，所以《玄》本身即含有三。上述三个基本符号，由上而下（《易》系由下向上数），是《玄》所含的天、地、人。《易》重三画为六画而为一卦，玄则四画（或称四重）而为一首。由三个基本符号，又加上一画为四画以成一首，也犹《易》由两个基本符号再加上一画，以变化成为八卦，是相同的，只是为了增加变化的缘故。《易》由两个基本符号再加上一画，才可变化成为八卦。再由三画加上一倍成为六画，才可变化成为六十四卦。《玄》由三个基本符号再加上一画，以成一首，因为较《易》多了一个符号，便可变化成为八十一首，以与太初历的八十一分的日数相准。……但扬子云又另出心裁，说这由上而下的四画，是表征方、州、部、家的。方是方伯，州是九州，部是郡县，家是家族。这便把政治社会的划分，也组入到里面去了。于是这四画，一方面是玄及玄所含的天地人，同时又是方、州、部、家。……八十一首，本是由四画的符号反复变化而来，但扬雄一定要由三的数字的推演来达到八十一首的与日分相合的数字，才认为可以表现《玄》的功用。……《太玄》的《赞》，等于《易》的爻。《易》每卦六画，一画一爻，所以每卦六爻。准此，则《太玄》每首应为四赞。但这样便首先脱离了三的生数。三的生数（自乘数）是九，此即所谓“分为三，极于九”，

于是每首不得不有九赞，始与玄的三的生数相合。……八十一首，每首九赞，所以《玄》有七二九赞，一赞为昼，一赞为夜，二赞合为一日，七百二十九赞，当为三百六十四日半，以合一岁的日数。……由三的生数而来的九赞的九，在《太玄》的实际应用上，有更大的意义。《玄》所含的是天地人，九赞便分别表证为天的始、中、终；地之下、中、上；人的思、福、祸；合而为九。在以人中心而加以实用时，九赞之九，便可成为思内思中思外，福小福中福大，祸生祸中祸极，又合而为九。……扬雄的用心是认为《玄》起于三，由“生”，即由三数的推演，说明《玄》的生化作用，以与历相合。更由此以定行为的准则，并测出休咎。<sup>〔46〕</sup>

《太玄》虽承《周易》而来，但其结构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可见扬雄并不是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承继既有之结构上又依据自身的思考而加以改进，实际上不过是披上模仿的外衣。张衡曾经评论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汉四百年，《玄》其兴矣。”<sup>〔47〕</sup>在张衡看来，《太玄》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事实上，后来的发展也引证张衡的说法。又如赋，这一文体对于扬雄有着重要意义，这不但表现为他曾经为这一文体倾注大量心血，同时也对这一文体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姜亮夫先生曾经对历代拟骚之作有过这样的评论：“其上者探灵均孤忠之核，以得其慨感幽深之志，多出二资人失志之所为。其次者善体屈子心志，镵入无间而章拟句摹，亦得其韵调之形似，则文士工巧之术：其最下者，则取九篇七章之体，为无病呻吟之文，既无屈子忠欵之忧，亦蔑玉、差修辞之俊。空存挽，不见志趣。”<sup>〔48〕</sup>扬雄写过《反离骚》《广骚》《玮牢愁》《天问解》，目前只存《反离骚》。此赋在句式方面有模拟《离骚》之处，但其根基在于对屈原人格的推崇以及对其命运的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判精神。<sup>〔49〕</sup>后人认为此作是屈赋之饕餮，实在是一种误会。“从文体风格看，扬雄反骚系列创作远绍写可，辞韵沉腿，别开新境。后世如唐皮日休《反招茂》、金赵秉文《反小山赋》、明徐昌业《反骚》、清：王碗《反招隐》等，皆步其涂辙。”<sup>〔50〕</sup>扬雄的大赋是在效仿司马相如之基础上创作的，然而二者的差导也是鲜明的，徐复观先生指出：“试将相如的《子虚》，《上林》，与子云题材略为相近的《校猎》，《长杨》，略加比较，则前者的规模阔大，而后者约结构谨严。前者散文的成分多于骈文，而后的骈文成分多于散文。前者的文字疏朗跌宕，而后者约文字紧密坚实。盖天才地想象，在空间中拓展，有如天马行空；而学力地思索，在事物上揣摩，有如玉人琢玉。所以一个是壮阔，一个是精深。相如在酝酿成熟以后，尽挥斤八荒之能；而子云在覃思殚虑之余，以绵密地安排，穷尽搜巉刻之巧。若以画品相比配，则相如之赋为纵逸，而子云之赋为精能：相如夸诞的性格，因其气势之勃盛，神采的飞扬，皆凸显于文字之中。子云沉寂的性格，使他常气导而神郁。”<sup>〔51〕</sup>许结先生也总结说：“扬雄的大赋创作自云规摹相如，但从其作品内容看，则于铺陈肩美之中更有讽谕之义，泄露出对身世安危与王朝前途的忧患；从其作品艺术风格看，则于艳词中寄托深思，于瑰奇峻极的美境中显示隽永的理趣；从其作品形式结构看，则显得短小灵活，便于放宽思虑，扩大题材。”<sup>〔52〕</sup>至于扬雄的《太玄赋》《解嘲》《解难》，许结先生将它们称之为太玄系列，这些赋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第一，它充分发挥了扬雄创作风格中属意深远，理赡辞坚的特点，创建了西汉辞赋中罕见的哲理小赋：如《太玄赋》，以骚体之形式，写深邃之哲理，篇幅虽短，却述理精密，造境开阔。再如《逐贫赋》，首创四字句法，于整饬形式中骋纵横之气，志隐味浓，开东汉说理小赋之先河。第二，扬雄受道家‘玄览’、‘虚静’思想启迪，于太玄系列作品中创造了一种‘玄静’‘仙游’的艺术审美境界，其间的自我精神既不同于反骚系列中的哀怨，也不同于大赋系列中的慷慨，而是作者沉浸于‘知玄知默’的思虑与浮游于‘爱清爱静，游神之廷’（《解嘲》）的玄虚神奇的空间而汲取的一种超拔躯体的灵动。”<sup>〔53〕</sup>

然而，对于太玄系列，我们还应该估量扬雄在文体方面所做的创造。首先来看《太玄赋》，章樵在《古文苑·太玄赋》题注中说：“子云以为《经》莫深于《易》，故作《太元》以拟之，言其理微妙于幽元也。此赋推太元之理，以保性命之真。”<sup>〔54〕</sup>似乎含有强调《太玄赋》解释《太玄》的意味。钱钟书先生指出：“扬雄《太玄赋》。按仅在篇末曰：‘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全文皆明潜身远祸之意，未尝‘赋’其所

谓‘太玄，也？然则‘太玄’可‘赋，乎？曰：奚为不可！《太玄经》第九篇《太玄摘》即不协韵之《太玄赋》也。“<sup>[55]</sup>《太玄摘》是用以解释《太玄》的，《汉书·扬雄传》载：“故有《首》《冲》《错》《测》《摘》《莹》《数》《文》《挽》《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sup>[56]</sup>钱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太玄赋》的阐释作用，可是却以《太玄摘》为不协韵之《太玄赋》，这也难免让人将《太玄赋》与《太玄》二者联系起来。其实，《太玄赋》是一篇用来阐释“太玄”思想的赋作。<sup>[57]</sup>《解嘲》也是如此，人们通常将《解嘲》与《答客难》联系起来，这固然不无道理。可是，《解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用来解释《太玄》的，《汉书·扬雄传》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sup>[58]</sup>在这篇文章中，扬雄说：“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sup>[59]</sup>这些话语紧紧围绕《太玄》而来，有的实际上是直接阐释《太玄》的，不唯如此，李光地还认为《解嘲》“解《丰》卦之义，胜于传、注多矣”。<sup>[60]</sup>至于《解难》，《汉书·扬雄传》曰：“《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sup>[61]</sup>可见此篇也是回答《太玄》相关问题的。由此看来，扬雄写作这些赋篇的主要意图是用来解答人们对《太玄》所产生的疑惑，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可以视为《太玄》的阐释文本。因此，这些赋篇拥有新的文体意义，亦即“赋”这种原本是体物的文体却被扬雄用作阐释其它文本，从而具有某种训诂的效用。宇文所安先生说：“《文赋》的独创性至少部分来自‘文’这个主题与‘赋’这种形式的结合。”<sup>[62]</sup>陆机以“赋”的形式来讨论文学创作，这确实是赋史上的新现象，然而，在更深层面上，即用“赋”来阐释理论，这不能不注意到扬雄这些作品的开创意义。

《逐贫赋》的文体意义也值得关注。《九歌》是屈原在楚地祭歌之基础上创作的，具有浓厚的仪式氛围。其实，《逐贫赋》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仪式相关。钱钟书先生说：

扬雄《逐贫赋》。按子云诸赋，吾必以斯为巨擘焉；创题造境；意不犹人，《解嘲》虽佳，谋篇尚步东方朔后尘，无此诡诞。后世祖构稠叠，强颜自慰，借端骂世，韩愈《送穷》、柳宗元《乞巧》、孙樵《逐店鬼》出乎其类。……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晦日”、“送穷鬼”，韩愈亦呼“穷鬼”；后世则称“穷神”，如《夷坚志·补》卷一六《穷神》，且不复为五鬼，而为一妇。……彭兆荪《小谟觞诗集》卷一《楼烦风土词》第二首：“剪紈劈纸仿婵娟，略比奴星送路达；富媳娶归穷媳去，大家如愿过新年”，自注：“正月五日剪纸为妇人，弃路衢，曰：‘送穷’，行者拾归供奉，曰：‘娶富媳妇归’”，则此所送之穷即彼所迎之富，一物也，遭弃曰‘穷’，被拾曰‘富’，见仁见智，呼马呼牛，可以参正名齐物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据魏了翁《遂宁北郭迎富》诗、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一据《广川画跋》谓送穷必兼迎富，皆未引北宋初赵湘《南阳集》卷六《迎富文》：“淳化四年，送穷之明日，众人复迎富。”元、彭二家诗亦足佐证。穷与富均现女人身。<sup>[63]</sup>钱先生在此梳理一些有关送穷迎富仪式的记载，可见当时社会确实流传这样的习俗。宗懔在《荆楚岁时记》“晦日送穷”条中说：“按《金谷园记》云：‘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衣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sup>[64]</sup>《金谷园记》虽然提到送穷的习俗与颧頊之子之间的关联，但此习俗的渊源还是比较模糊的，不太容易确定它的演变过程。不过在汉代文献中还是多多少少留有这方面的记载，比如《焦氏易林》就多次提到“贫鬼”，如临之兑：“贫鬼守门，日破我盆。孤牝不驹，鸡不成雏。”损之剥：“贫鬼守门，日破我盆。毁罍伤瓶，空虚无子。”萃之随：“贫鬼守门，日破我盆。毁罍伤缸，空虚无子。”<sup>[65]</sup>又《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鲍宣上书曰：“今日蚀于三始，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sup>[66]</sup>这些记载似乎提示汉代社会已经存在送穷的习俗，因此，《逐贫赋》很可能是扬雄依据这一习俗而撰写的具有仪式特质的赋作。<sup>[67]</sup>

扬雄的文体创造还体现在箴、连珠方面，班固说扬雄以为“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sup>[68]</sup>按照班固说法，扬雄仿照《虞箴》而创作了九州之箴。班氏的说法需要做一些分析。《后汉书·胡广传》说“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也就是说，扬雄仿照《虞箴》制作的不仅是九州之箴，还有二十五官箴，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虞箴》其实是一篇官箴，《左传·襄公四年》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闾。于《虞人之箴》曰：……”<sup>[69]</sup>辛甲命百官，而百官“箴王闾”，可见《虞人之箴》为虞人所作，即是官箴。这样，二十五官箴是扬雄仿照《虞箴》制作的，但九州之箴就其文题而言，与纯粹的官箴有些差异，比如《青州箴》，它是以地方命名，而不是以官命名，这不能不说是扬雄对《虞箴》的某种发展。其次，即使就二十五官箴而言，扬雄的创造性也是存在的。《虞箴》是虞人献给周武王的箴辞，然而二十五官箴却是扬雄模拟各官职守的口巧而撰作的，这就表明这些箴文并非出自当事官员之手。因此，扬雄这种改变撰作主体的做法“不·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箴体与规谏方式之间存在的联系，同时也为酝酿箴体的新变提供了某种契机”。<sup>[70]</sup>至于连珠体，《文心雕龙·杂文》说：“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sup>[71]</sup>刘勰明确认为连珠这种文体是扬雄创造的，可是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存在其它看法。按照我们的考察，“先秦时期的说辞传统造就了连珠的核心体制，但连珠的最终生成又与格言辑结风尚有关，《语丛》的文体及编纂方式在这方面为连珠的生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语丛》的编纂用于教育太子，扬雄创作连珠主要是基于讽喻的目的，而在班固、贾逵、傅毅诸人手上则明显地呈现出奏议、章表的功能。”<sup>[72]</sup>因此，扬连虽然未必是连珠的创造者，但在连珠体发展环节上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

### 三、《法言》的文体意义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注意《法言》。《汉书》本专：兑“象《论语》，号曰《法言》”，又说“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法言》效仿《论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法言》又是如何效仿《论语》的，这是需要澄清的；其次，《法言》的命名又显示扬雄似乎有意拉开二者的距离，由于这种距离引起的差异又是如何，这也是需要辨析的。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其一，《论语》的篇名往往来自每篇首句的前两个字，如“学而”、“为政”等这种情形之下的篇名大都只起着标目指示的作用，与文中内容大都并无实质性的关联。这也是早期文献的通例。扬雄时代篇目命名早已改变这种做法，但是，《法言》每篇的命名仍然采取《论语》的做法，通常选取每篇首句的前两个字作为篇名，如“学行”、“吾子”等。其二，《论语》二十篇，首篇《学而》，末篇《尧曰》，儒门注重学习，强调“学而优则仕”，所以《学而》被置于《论语》的第一篇，就是要揭示儒门的这个宗旨。此后《荀子》的篇目以《劝学》开始，以《尧问》结束，其实是遵照《论语》的这个格局。在这个问题上，《法言》也是如此，首篇《学行》，末篇《孝至》。扬雄在《学行》首章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sup>[73]</sup>在此，扬雄将“学”划分为行、言、教人及什么也没有几个层级，他将力行修身置于最先，这是符合儒门一贯的思路。《学而》篇“学而时习之”其实也是强调学与行的联系，扬雄《学行》的命名应该说更能揭示这个思想。这就意味着扬雄在精神底层对《论语》的精确把握与效仿。其三，《法言》模拟《论语》的句式，有时甚至是移录《论语》的句子。有学者指出《法言》模拟《论语》有三种方式：“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sup>[74]</sup>如《学行》“有教立道，无心仲尼，有学术业，无心颜渊”，<sup>[75]</sup>这是对孔子“有教无类”说法的变化；又《问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sup>[76]</sup>的说法就是借用孔子“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等等。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方式虽然部分涉及句式或句子，但主要还是对《论语》句意的模拟。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法言》模拟《论语》句式的现象。《汉书》本传说“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sup>[77]</sup>照此说法，《法言》似乎载录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其实，在《法言》中，有些并不采用问答的形式，如前引《学行》“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又如该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学以治之，思以精



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sup>〔78〕</sup>等。《法言》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曾经指出，《论语》在结构上呈现记言与记行两录的模式，在记言之外，还存在单纯记行的成分。<sup>〔79〕</sup>《法言》的上述现象其实是效仿《论语》。当然，《法言》模拟《论语》句式还不仅于此，如《修身》篇“君子之所慎：言、礼、书”，<sup>〔80〕</sup>这其实是来自《述而》篇“子之所慎：斋，战，疾”的启示；又如《渊骞》篇“美行：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言辞：娄敬、陆贾。执正：王陵、申屠嘉。折节：周昌、汲黯。守儒：辕固、申公。笛异：董相、夏侯胜、京房”，<sup>〔81〕</sup>这也是效仿《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的写法。还有，《法言》有时还直接引述《论语》的句子，如《寡见》篇的“不有博弈者乎”就源自《阳货》。由此可见，《法言》取法《论语》是多方面的。

尽管《法言》多层次效仿《论语》，但诚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书“内容显得较为丰富，除了哲学思想之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军事、古今人物和历史事件、诸子百家、古典文献等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时知识界的所有领域。……意欲以圣人之道为标准，重建价值体系之作。”<sup>〔82〕</sup>也就是说，《法言》并不是以效仿《论语》的形式为目的，而是借助这一形式来阐发扬雄本人的精神、思想诉求，由此，《法言》的创新也就是一种必然。从文体的角度来说，《法言》较《论语》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汉书》本传云：“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sup>〔83〕</sup>由此可知《法言》是扬雄在平时与他人问答的言论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但是，与《论语》不同，《法言》并没有出现他人的姓字，通常是以“或曰（谓）”、“或问”提出问题，以“曰”的形式作答，在这一问答体式中，问者的真实身份其实很容易引起质疑，或者说提问者有可能根本就不在场，亦即提问者是由于作者构思的需要而被有意地虚拟，那么，这样的构思方式与赋的主客问答写法并没有大的区别。<sup>①</sup>其二，《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纂辑而成的，但《法言》并非后人辑录扬雄的语录而成，而是出于扬雄有意的创作，所以，表面上看来，各篇是由一条条互不连贯的语录组成，但实际上每篇都有一个中心议题，这可以从《序》中反映出来。其三，在语言方面，《法言》也显示了与《论语》的不同，徐复观先生说：“从全书的文体看，他是力追《论语》的文体，……但《论语》除极少数文句外，皆温润圆满，明白晓畅，这是短章散文中的极品，或者可称之为神品。……《法言》字句的结构长短，尽管与《论语》极为近似，但奇崛奥衍的文体，与《论语》的文体，实形成两个不同的对极。若说《论语》的语言，与人以‘圆’的感觉，《法言》的语言，却与人以‘锐角’的感觉。”<sup>〔84〕</sup>这些差异显示了《法言》与《论语》在文体方面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正是扬雄为何将这部文献取名《法言》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法言》的文体与“语录体”之间难以划等号，因为《法言》是扬雄出于宗经的目的而仿《论语》之作，可以说是一种创作；而《论语》则是对孔子日常言论的汇集。当然，《法言》模仿《论语》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学者称之为“拟语录”，确实符合《法言》的文体特征。整体上来看，扬雄宗经及仿《论语》而作《法言》的作风，尽管招致一些批评，不过，他的这一行为在后世也得到一些效仿，典型者如班固《汉书》之法《春秋》，王通《文中子》之法《论语》，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整体上看，扬雄将一生的精力投入到著述活动之中，不但生产了大量的作品，同时在文体得创制方面也积累丰富的成果。这在注重“述”之传统的汉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3〕〔4〕〔6〕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49, 253, 249, 278.

①徐复观先生说：“扬雄中年后虽自悔作赋，但在作赋时对文句所用的功力既深，所以在写《太玄》写《法言》时，虽然力图摆脱赋体的铺排繁缛，但用奇字，造新句，不使稍近庸俗的文学家习性，依然发生主导的作用。”（见徐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308页）徐氏注意到扬雄《法言》与其赋在用词方面的关联，但对于二者形式上的联系似未措意。

- 
- (2) (5) (12) (32) (33) (35) (43) (56) (58) (59) (61) (66) (68) (77) (83) 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 1962. 1721, 1727, 3583, 3515, 3515, 3583, 3585, 3575, 3565—3567, 3571—3573, 3575, 3091, 3583, 3580, 3580.
- (7) (17)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 中华书局, 1983. 116, 172.
- (8) (13) (15) (47) 范晔. 后汉书[M]. 中华书局, 1965. 1511, 1511' 1724, 1897.
- (9) (18) 永瑍. 四库全书总目[M]. 中华书局, 1965. 1272, 1271—1272.
- (10) (24) (26) (34)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中华书局, 1958. 421, 422, 411, 413.
- (11) (19) (21)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046, 1042—1043, 1043.
- (14) 李昉. 太平御览(第五卷)[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633.
- (16) 束景南. 扬雄作州箴辨伪[J]. 文献, 1992, (4).
- (20) (22) 张震泽. 扬雄生平、作品评价及其他有关问题[J]. 辽宁大学学报, 1992, (3).
- (23) 张震泽. 扬雄集校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274-275.
- (25) (27) (28) 李善等. 六臣注文选[M]. 中华书局, 1987. 140.
- (29) 黄开国. 扬雄的著述活动与著作[J]. 成都大学学报, 1992, (2).
- (30) (31) 王春淑. 扬雄著述考略[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6, (3).
- (36) (37) (50) (52) (53) 许结. 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J]. 中国社会科学, 1988, (1).
- (38)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上海书店, 1986. 216.
- (39) (41) 于迎春. 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M]. 东方出版社, 1997. 73, 79-80. (40) (45) 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 1998. 1181, 1181.
- (42) 张少康, 刘三富.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52. (44) 汪荣宝. 法言义疏[M]. 中华书局, 1987. 164, 166.
- (46) (51) (84)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01—303, 290, 308.
- (48) 姜亮夫. 楚辞书目五种[M]. 中华书局, 1961. 404.
- (49) 陈恩维. 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J]. 中国韵文学刊, 2003, (2).

- 
- (54) 章樵注. 古文苑[M]. 商务印书馆, 1937. 93.
- (55) (60) (63) 钱钟书. 管锥篇(第三册)[M]. 中华书局, 1979. 956, 956, 961-962.
- (57) 束景南. 《太玄赋》非伪作辨[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3, (5).
- (62) 安宁. 从“赋体话语”窥“言意关系”[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11, (2).
- (64) 宗懔撰, 宋金龙校注. 荆楚岁时记[M].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30.
- (65) 尚秉和. 焦氏易林注[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198, 411, 447.
- (67) 马宗昌, 张淑玉.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3).
- (6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 1990. 938.
- (70) (72) (79) 夏德靠. 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M]. 中华书局, 2015. 313, 336—340, 199.
- (71)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254.
- [73][75][76][78][80][81] 李守奎, 洪玉琴. 扬子法言译注[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 15, 70, 2, 4, 32, 172
- (74) 解丽霞.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4, (2).
- (82) 郭君铭. 扬雄《法言》思想研究[M]. 巴蜀书社, 2006. 5-6.